

树基沟小学坐落在沟里南山坡上,居高临下,目力所及,依次是居民房、托儿所、镇政府、火车站、医院、菜地、河套,过河套是北山。老铁家即住在学校下面的居民房里,应该算作小镇的上片,是我们上下学的必经之地。

我经常去老铁家玩,尤其是周三周六,因为下午没课,中午放学时就随他去家里打一站,看他收藏的小人书,或他画的画。对,老铁爱画画,这一点和我一样,用他大哥的话说:我们拥有共同的志趣和爱好。

可我们终没有坚持下去。上初中以后,我基本是不画画只练毛笔字了,老铁则几乎是什么也不练了,毕竟这只是一个爱好,与升学无关。若干年后,老铁总结道:做什么事情没长性,浮精。这当然是他的自嘲。

其实,老铁是一个学习比较好的学生,虽然也偏爱文科,但却不像我那么严重。

我们矿山小镇的居民,除了大多数是工人户和农民户外,还有一部分是地质勘探101队的职工、家属,老铁属于后者。所以初三时,当我们大多数应届毕业生准备复读一年再考矿山技校时,老铁因为是101队子弟,不在此列,所以他只有到矿上念高中奔大学这一条路。这时,他的家也搬到了矿上:一个比树基沟更大的矿,全称中国有色金属抚顺红透山铜矿,是建国以来最著名的矿山之一。

一年后,我到矿上念技校,老铁听说他们101勘探队所属的冶金系统也准备办技校了,就放弃了高中学习,只等技校招生。学习好,信心足,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1990年代,在工厂里做工程师的我爸爸喜欢画画,和古法山水点景的亭台楼阁不同,我爸的山水画里的点景之物是高压线塔或拖拉机。儿时的我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,因为他画的都是带我们春游路上看到的山山水水。可上了美院之后,我发现几乎没有一副山水画上有电线塔,即便我们自己,在进行风景写生时,也会心照不宣地无视山间的高压线塔和农田里的联合收割机,拍好的风光照在发朋友圈之前,也会想当地P掉树梢上空的几根电线,就像删掉乱入的路人甲。

如同今天人们对高压线塔及联合收割机的态度一样,早年的荷兰风车也经历过这样的歧视。尤其是神职人员对这些具有险恶的异己性质的东西很过敏,布道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抨击风车,村民们也会烧掉这种早期工业化的产物。对风车价值和作用的重新评价,要归功于荷兰全盛时期大画家们

冶金技校招生的消息迟迟不来,老铁就向父亲借了钱,去矿上冷冻库批发冰棍卖。那几日,他时常骑着一辆28型自行车走街串巷,东一嗓子,西一嗓子,等人家推门出来买时,他却没了踪影,最后半箱冰棍化成水滴。

不好意思啊,跟下岗女工争食,老铁说。

那时我住在职工宿舍,晚上没事,老铁就会找我来玩。我们虽然早已不画画了,但还是喜欢看书,尤其是一些文学类的书刊,甚至也偷偷地动笔,写些诗歌、散文、小说,进行所谓的创作。除此之外,我们似乎就剩下喝酒了。

记得有一天,本来我已经吃过晚饭,一个人在宿舍发呆。老铁来了,说今天是你的生日,走,请你喝点酒。我说算了,不老不小的过什么生日啊!咱们骑车子出去玩吧。

我们点了四个菜,两束白酒——不知为什么,那时管装白酒的搪瓷壶叫束,也许因其细高的缘故吧。每束装二两酒。酒菜上来,我俩也不说什么生日快乐,更没有蜡烛,哥俩好,就喝呗。这一喝不要紧,最后是每人四束下肚,时间已到夜半。老板娘见我们喝高,还没有走的意思,先说打烊,再说路远,最后干脆叫来几个小子,出来进去的,不时用眼睛睨着我们。

老铁说算账,不过身上只有20块钱。

几个小子看看桌上的杯盘,居然没吱声。

老板娘赶紧说,钱不给都行,只是时间太晚了,担心你俩怎么骑车回去。

车,我俩肯定是骑不了了,只能推着走。可是,离开饭店没

的作品,画家们对这些为荷兰带来生机的机械进行了充满感情的审美投射,风车被放置在画面的C位,它们在风暴中安详坚忍,它们在黄昏的金色光线下熠熠生辉,直到后来,风车形象成为荷兰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标的物。

阿兰·德波顿的《工作的迷思》里,写到一位在苏格兰乡间安装高压电线塔的工人伊恩,他是“高压输电线塔鉴赏协会”的会员。这个团体非常小众,财力匮乏,他们都不太好意思说出自己的爱好,因为它不像热爱田园风光那么顺理成章,甚至不像个正当的爱好,就像《花束般的恋爱》里的男主音麦,邀请喜欢的女孩八谷娟去看硫化罐,这种与众不同的癖好特别小众,简直像一个怪癖。

作为厂矿子弟的我对这种着迷于工业之美的感情很是理解,小时候每次跟父母去车间,就像进入了一个神秘的异度空间,齿轮飞旋、火花飞溅,机

月光城 散文

程远

老铁



多远,我就连摔几个跟头——不仅车把扭歪了,链子也掉了,老铁只好把他的车给我推着(他个子比我高,也比我清醒),他扛着我的车走。最后实在走不动了,我俩索性就坐在路边,而这,离矿山还有七八里路呢!此时已是夜里一两点钟了,除了村里狗叫,万籁俱寂。

许久,远处传来汽车的马达声。老铁从怀里掏出一把菜刀(去饭店后院撒尿时顺的)站在路中间,挥手。车停了。这是一辆从抚顺拉啤酒开往梅河口的大货车,正顺路。司机说行,去推自行车吧。我俩高兴,谁知刚一转身,司机猛踩油门,汽车呼啸而去,但没走多远,就听几声脆响——原来大货车甩下两箱啤酒。也许司机没发觉或是发觉了也不想停下。我和老铁却高兴起来,酒,似乎也醒了一半。我们拣起没有摔坏的啤酒(瓶)用牙咬开,然后一人坐一个箱套,边喝边骂货车司机:傻货!

这是我与老铁喝酒最猛烈的一次,当然也付出了一定代价,比如我的一个手指甲刮掉了,他的裤子划破了。

大约1987年前后,老铁去抚顺上了冶金技校,然后参加工作,我们虽不能经常相见,但还保持着通信往来。当我今天要写这篇文字的时候,我翻出老铁曾经写给我的信,一共七封。第一封写于1990年4月14日,最后一封是93年8月3日,但肯定有遗失的而不止这些。其内容也是包罗万象,工作,爱情,文学,艺术,

前途,命运,即便后来都有了手机电话,也是无法替代那种笔与纸的真挚交流。

1992年我结婚,和妻子租住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黄泥小屋。妻子在一家集体企业当工人,干计件,经常加班,我也只是一名普通的公司职员,收入自是不多。我们每日为柴米油盐人情礼往所累,还要偿还结婚欠下的债务,所谓的理想早已烟消云散。那段时间,一定是我人生中最灰暗最苦闷的日子,所以才有了离家出走的想法,尽管只是一闪,惹得朋友牵念。

老铁来信要求我去抚顺一趟,让我给他带些书。我知道这是借口,去,就是聊天喝酒呗。

那时,市场上流行一种叫作小红梅的2两装白酒,度数不高,辣而不呛。在老铁家附近的一个小饭馆,老铁喝了4个,我喝了6个。然后我们来到浑河岸边,那里有一片金黄的向日葵,开得正烈。一位头戴凉帽的画家坐在地上写生。借着酒劲,老铁也要画一幅。画家无奈,只好换上一张纸。刷刷刷,老铁将艳丽的黄色堆积到画纸中央,将绿色环衬周围,将蓝色渲染天空,将赭色涂满大地,最后,将灰色画成两个长长的身影,沿着浑河逆流而行……

画家说,小伙子练过啊!敢情。

老铁让我也添上几笔,算是合作。他说:说不定这幅画被谁收藏呢!到时候,咱哥俩可就发大财了。这当然是笑话。不过我还是在画纸一角写下了凡·高的一句话: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火,路过的人只看见烟。



月光城 随笔

肖遥

风景画里的拖拉机

器轰鸣起来,就像神秘的怪兽呼啸而来……在等候父母下班的无聊时光里,车间门口成了我的游乐场,钢筋下弦杆是我的游戏器械,废弃的零件池是我的百宝箱。随着工业时代的过去,这些车间、厂房、包括和车间门口的植物梧桐树和四季青,在记忆之水里荡漾,都变成了摇曳的镜花水月,成了一种可望而再不可及的追忆和牵挂。它们偶尔在电影里出现,比如《青红》《钢的琴》里的镜头,给老厂区赋予了一种忧伤寥落之美。在一个工厂长大的孩子心中,还有什么能比混凝土花池、红砖墙面、水塔、烟囱以及炼胶炉、硫化罐等更令人心潮澎湃呢?就像伊恩对高压线塔的感情,他能从不同形状的线塔中看出谦逊与傲慢,正直和奸诈。我面对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零件,也像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熟人,识别出可爱或讨厌,分辨出独特

或平庸。

爱默生认为,对于怀着思古幽情的诗人,和那些兴致盎然的留意到铁路、仓库、运河和工厂的诗人,他更加欣赏后者。因为,前者看到由村庄变化而来的工厂和铁路,便以为它们破坏了美丽的风景,那是因为工厂和铁路尚未在他们读到的书中被神化,真正的诗人却没有分别心,他们认识到这些景致均是自然伟大造化的一部分:高压线塔、硫化罐以及联合收割机的壮美,与蜂巢或蜘蛛结出的几何网状的精巧之美相比毫不逊色,现代建筑师为了达到了环保减碳的效果,设计的变色变温屋顶,相比较下雨天自动闭合的松果和追着太阳转头的向日葵,同样的精美绝伦。用爱默生的话说“大自然很快便将它们纳入她自己充满生机的范围中,她爱飞驰而去的火车,并将其视为己出。”